

# 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挑战与方向

孙吉胜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切实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多方努力，加大对外发声力度、拓宽发声渠道、丰富话语内容、增加话语主动性、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还面临多重挑战，中国主题“他议”和中国形象“他塑”现象依然普遍，对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和误读，一些国家无理打压中国媒体和媒介，针对中国的负面信息经常搅动世界舆论，使中国不时面临国际话语和舆情压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具备基本对外交流能力、专业能力、话语塑造能力和舆论把控能力，也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共情能力。为了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关切，在世界上塑造公正、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中国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多层话语内容、多样话语风格、多元话语主体、多维话语平台以及多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和舆论环境，增进各国相互信任，加强国际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能力 国际传播 话语权 国际舆论 中国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其国际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共中央第 30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

\* 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北京 100037）。

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sup>①</sup> 国家发出了号召、提出了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媒体、学界等也加大工作力度，在完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等方面不断努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也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有时是话语陷阱和话语屏障，有时是话语诋毁和话语攻击，有时需要紧急应对和化解舆论热点，有时对外发声与收效不成正比，在对外话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方面，与一些大国相比存在差距，不能有效引领国际舆论。如何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亟需破解的一个难题。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外话语能力是基础，而国际传播是话语产生效果的关键。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明确话语重点，在重要方面加大话语投入；需要及时调整话语风格，鼓励多元话语主体有效发声，拓宽对外传播渠道，培养跨领域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从多个维度确保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达到理想的国际传播效果，在国际舆论场中塑造客观、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中国认知和中国观。

## 一、对外话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与外界交流、沟通和互动的载体和体现，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理解其侧重。狭义而言，对外话语体系一是强调对外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二是强调通过某些语言的频繁使用和社会化过程而沉淀出来的主要话语，三是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主要问题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表象，四是强调在交流过程中所形成和延续的主要叙事风格和言语习惯。它蕴涵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等多种要素。<sup>②</sup> 国家通过对外话语体系展示和宣介自己的国家意志、诉求和行动，回应外界关切，促进沟通交流。它不仅承载一个国家的客观现实、传统思想和精神，也体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也是外界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的重要媒介。广义而言，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强调对外交流的具体语言、话语内容、对外话语主体、对外话语媒介、对外话语传播平台及传播效果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缺一

---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sup>②</sup> 王晓辉：《讲好中国故事，创新话语体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7页。

不可，共同作用于国家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国家利益维护。其中，国家对外话语能力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最基本的一环。

国家对外话语能力主要指一个国家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有效实现交流意图、达到所期待的交流效果的能力，其强弱直接影响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效。对于中国而言，对外话语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基本对外交流能力

基本对外交流能力主要指用外语进行日常交流、满足日常基本交往需要的能力。对中国而言，实现对外交流主要依赖的是外语，而英语是当前国际交流的主要语种。由于汉语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差异，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以及欧洲很多英语非母语的國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不占优势。因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1983年，英语正式被列为高考主科，成绩100%计入高考总分。无论是中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中的英语专业和公共英语教育都快速发展。1987年和1989年，中国首次举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和大学英语六级考试。90年代后，中国的外语教育开始更加注重提高外语运用能力，199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2000年颁布《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二者都强调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外语运用能力。经过积累和努力，中国各高校在英语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2010年，各高校设立了1000多个英语专业。<sup>①</sup>每年招收16万名英语专业学生，每年约有15.7万名学生参加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也没有间断英语学习，每年约有1000万名学生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这些努力使中国民众的基本英语交流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当然，在国际交流中，能用对方母语交流效果更好，更容易拉近距离、增强交流效果。近年来，尤其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日益重视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很显然，如果要取得更好的国际交流和传播效果，针对不同国家使用其母语是最佳选择。

### （二）专业能力

话语背后是有内容的，语言只是呈现内容的载体，内容需有专业能力支撑，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不可或缺。当前，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深度和广度的延展，中国对外话语涉及的领域日益多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议题不断增多。以中国外交为例，过去外交更多事关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而当前外交既包括高政治领域问题，也涉及金融、贸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公共卫生、能源、科技等低政治领域问题，网络、太空、深

---

<sup>①</sup> 李莉文：《英语教育发展》，载王定华、杨丹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回响——中国共产党外语教育1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年，第121页。

海、极地、人工智能等新疆域议题也不断涌现，且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经常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且专业性强，知识更新速度快，仅接受外语专业训练已无法满足需求。对外交流要确保能用外语有效讨论专业性问题，有无专业能力直接影响交流的深度和质量。此外，专业性还体现在是否具有区域国别知识，是否掌握各类具体政策。可见，外语和专业能力缺一不可，专业能力不足很难保证在交流过程中立场鲜明、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 （三）话语塑造能力和舆论把控能力

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人们不仅通过语言来交流，对某些语言的频繁使用会沉淀成一些主要话语，形成针对某个问题以至某个国家相对稳定的表象，且这些表象成为其对外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塑造外界的认知结构。例如，美国在其对外话语中总是强调民主、自由，很多叙事都与民主和自由相关。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理由之一就是要帮助伊拉克推翻残暴专制的萨达姆政权，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中非常普遍。美国也经常以民主和自由为名批评其他国家。而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哪些话题、哪些内容能够进入话语过程，并在国际舆论场中保持其话语影响力，影响、引导和塑造国际舆论，则是话语塑造能力强弱的直接体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议题设置，构建话语主题，选择时机发布，迅速引起大众关注，经过高频重复成为舆论焦点或热点，进而影响相关决策和行为。根据研究，议程设置主要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些问题上，忽视其他问题，使其进行选择性的注意。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等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表明，媒体不仅可以影响公众关注哪些核心问题，还可以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属性认知。<sup>①</sup>该过程不仅涉及话语内容，还涉及叙事风格和修辞手段，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使话语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国际舆论。例如，围绕南海问题，美国2016年制造了“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这样的话语，使其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一个话语焦点，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话语压力，也影响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耗费了不少外交资源。再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一些国家挑起“债务陷阱”这一话题，使“一带一路”与债务陷阱关联起来，影响了世界对“一带一路”的客观认知。这类话语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很多时候通过语言可以塑造话语危机，话语危机可以引发安全危机，甚至助推战争。<sup>②</sup>相反，如果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中巧妙铺

<sup>①</sup> 参见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sup>②</sup> 参见孙吉胜：《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第39—62页。

垫语境、塑造议题，则可以引领国际舆论走向，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 （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共情能力

国家对外话语能力的强弱还体现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共情能力等方面。思辨能力体现在能否有效阐明自己的观点、反驳他人观点以及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共情能力主要是指能否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感受和理解他人心情，强调的是能否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这些能力决定了是否会把自己的观点生硬强加于他人，是否照顾到话语受众的言语习惯、文化传统和认知基础，从话语受众角度选择话语内容和叙事风格，使自己的话语能被客观理解和接受，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与上文所述的基本对外交流能力相比，这些能力的运用对言语者的外语水平要求更高，超越了简单日常交流，而是要用外语进行反驳、辩论、说服等话语层面的博弈，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都需要通过外语的运用体现出来。当前，在一些国际场合，不少人可以用外语讲自己的论文或是简单发言，但是在讨论环节由于无法做到即时互动，经常效果不佳。就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言，对外交往的跨文化性需要言语者具有文化敏感性和包容性，清楚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了解不同文化的交流禁忌以及所隐含的“政治正确”，据此选择言语内容和言语方式。例如，在一些文化语境中，政治观点、宗教、种族、性别等都是敏感话题，不要说展开讨论交流，就是提及相关内容都需格外谨慎，否则即便发声也往往效果不彰，有时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

## 二、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认识到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多次强调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重视对外话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传播能力。

#### （一）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一方面，强调在对外宣传中讲好中国故事。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sup>①</sup>2013年9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

<sup>①</sup>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网，2013年8月21日，<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3/0821/c25408-22635863.html>。

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再次强调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积极传播中国声音。<sup>①</sup>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sup>②</sup>

另一方面，强调要让中国对外话语产生国际影响。2016年2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会议明确要求，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sup>③</sup>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30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sup>④</sup>

可以看出，中国清楚认识到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认识到，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与有效国际传播相互关联，也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 （二）在行动中多方努力

一是加大对外发声力度，确保话语在场和话语有效。话语在场是话语产生影响的基础，可以减少话语缺失，避免中国故事总是被“他述”、中国议题总是被“他议”、中国形象总是被“他塑”的情况。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

---

①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书记要求下大气力》，求是网，2021年6月2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1-06/02/c\\_1127522717.htm?ivk\\_sa=1024320u](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1-06/02/c_1127522717.htm?ivk_sa=1024320u)。

② 《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华网，2013年12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

③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书记要求下大气力》。

④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6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

本解决。”<sup>①</sup>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在国际层面发声，明确表达中国观点和立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出访的重要时机一般都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讲述中国的发展、中国与到访国的历史和友谊以及中国主张和政策。例如，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尼泊尔前夕，在其主流报纸发表题为《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的署名文章，在谈到中尼友好交往历史时指出，“1600多年前，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互访对方国家，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中国唐代时，尼泊尔尺尊公主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高僧玄奘到访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并留下珍贵文字记录。元代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率工匠来华，主持修建了北京妙应寺白塔等宏伟建筑。这些友好佳话，激励着两国人民世代代相知相亲、携手前行。”<sup>②</sup>

除了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外，在一些重要时刻，中国国家领导人还直接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与当地民众直接交流。2019年6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了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报》联合采访，不仅提及中俄友好历史、贸易往来，也专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金砖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合作等，涵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发展的多个方面。<sup>③</sup>这些文章、讲话和访谈拉近了与当地受众的距离，为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政府官员积极主动阐明中国立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向世界更好地宣介中国的抗疫努力和主张，2月1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柏林接受路透社专访，明确表示：“我们以中国速度日以继夜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用中国力量众志成城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经过艰苦努力，疫情总体上得到了控制……中国采取的果断措施是正确和有效的”。他同时强调：“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公开、透明的态度，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开展国际合作，努力阻止疫情在全球扩散。”<sup>④</sup>再如，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把中国定为“最严峻的竞争者”，表示中美将展开“极为激烈的竞争”，对此，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021年4月16日接受美联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年5月30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6/0503/c117092-28320564.html>。

② 习近平：《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外交部网站，2019年10月1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1910/t20191011\\_\\_9870487.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1910/t20191011__9870487.shtml)。

③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主流媒体联合采访》，外交部网站，2019年6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1906/t20190605\\_\\_7946114.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1906/t20190605__7946114.shtml)。

④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接受路透社专访实录》，外交部网站，2020年2月1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2002/t20200215\\_\\_9870581.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2002/t20200215__9870581.shtml)。

社专访，阐明中国的中美关系原则和立场：“美方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并以竞争、合作、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我们对此并不赞同……我们主张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sup>①</sup> 2021年12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以“炉边谈话”方式接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采访，坚定表明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态度。<sup>②</sup>

三是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元。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发声渠道日益多元。在一些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国际问题上，外交、媒体人员在网站、报纸接受采访或发表署名文章，努力传播中国声音。例如，在抗疫关键时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020年4月6日在《纽约时报》发表《同舟共济，定克时艰》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面对疫情应团结合作、互帮互助，强调中美两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性。<sup>③</sup> 在每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直面问题，在必要时直接进行话语反击，阐明中国观点和立场。例如，在谈到美国“民主峰会”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无视自身种种问题和劣迹，反而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题，将民主‘标签化’‘政治化’。”<sup>④</sup>

不少外交官和媒体人士也利用新媒体，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积极发声，宣传中国主张和观点，对国外一些针对中国的污名化、标签化的不实报道和评论进行有理有力的回击。例如，英国2020年7月14日宣布在5G建设中禁用华为设备后，中国驻英大使张晓明连续在推特上发声强调：中国将全面、认真评估英方关于华为的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一直将欧洲视作平等的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为欧洲创造了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双方应加强互信，通过合作实现双赢。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经常在推特上发声，阐明中国观点，与国外受众互动。再如，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播刘欣以及驻美主持人、记者王冠等在推特平台上“主动出击”，推送中国时政新闻资讯以及热点事件评论，助力提升中国媒体音量。<sup>⑤</sup>

四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更加全面，博弈、斗争意识增强。受冷战思维、

---

①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美联社专访实录》，外交部网站，2021年4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104/t20210418\\_9180785.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104/t20210418_9180785.shtml)。

② 《秦刚大使接受多家美主流媒体联合采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2021年12月24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dshd/202112/t20211224\\_10475267.htm](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dshd/202112/t20211224_10475267.htm)。

③ Cui Tiankai, "China and the US Must Cooperate against Coronavirus",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20.

④ 《2021年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年12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112/t20211231\\_10478030.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112/t20211231_10478030.shtml)。

⑤ 姬德强、朱泓宇：《“网红外宣”：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悖论》，《对外传播》，2022年第2期，第54—55页。

不同意识形态等影响，世界上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变化，存在很大的认知偏差，一些偏见和误解更是根深蒂固。近年来，中国加大自身宣介，让外界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形成全面、客观的中国观。仅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新办）就发布了14个白皮书，涉及中国的民主、减贫实践、应对气候变化、全面小康、生物多样性保护、尊重和保障人权、新型政党制度、国际发展合作、香港及“一国两制”等多个方面，对一些国家的无理抹黑和攻击进行系统回应。<sup>①</sup>针对一些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围绕新疆的发展变化大做文章，甚至用“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不实诬蔑之词攻击中国，国新办专门发布《新疆的就业保障》《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新疆的实际情况和势头。为了更好地宣介中国风貌，外交部还开展系统推介活动，以省市为单位定期向全球推介，展示各地的特色和成就。

在全面介绍、宣传自己的同时，中国在对外话语层面也增强了博弈和斗争意识，揭批一些国家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美国经常借人权问题抹黑攻击中国，对此中国专门发布《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疫情失控、政治乱象、种族歧视、社会动荡、贫富分化、践踏国际规则等问题。<sup>②</sup>针对美国对中国疫情防控的不实报道和污名化，2020年5月新华社发布题为《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逐条回击种种谎言。<sup>③</sup>2012年至2013年间，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频发暴行、侵犯人权，对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也予以鲜明谴责，表明中国态度。<sup>④</sup>

五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使对外话语有效传播。对外话语只有在国际层面有效传播才能产生效果。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以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全球的国际传播景观得以重新塑造。脸书、推特、油管等互联网平台在全球传播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打破了原来由专业新闻机构和影视文化产业所主导的传统国际传播模式。如何统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的作用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点。

为此，一方面，中国改变国际传播意识，强调外宣和内宣的差异，内外

---

① 具体可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a.gov.cn/zfbps/ndhf/44691/index.htm>。

② 《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1年3月24日，<http://www.scia.gov.cn/37234/Document/1700891/1700891.htm>。

③ 《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新华网，2020年5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5/09/c\\_1125963436.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5/09/c_1125963436.htm)。

④ 《2021年9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年9月23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09/t20210923\\_9584070.shtml](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09/t20210923_9584070.shtml)。

有别、外外有别，不简单以对内宣传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随着国际、国内信息的交叉融合，当前已无法完全把内宣与外宣区别开来，在对外宣传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间的差异，选取不同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要考虑国际层面直接话语对象的感受，同时也需要照顾到第三方，以至所有国际受众的感受。另一方面，各类媒体积极改善传播基础设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传播媒介是各国媒体话语权和传播话语权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中国媒体努力搭建传播平台，改善传播基础设施。作为三大央媒，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努力建设国际传播新矩阵，通过技术、体制、管理、平台创新等提升国际传播能力。<sup>①</sup> 2016年12月，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成立，建有六个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一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同时建立了英文等外语直播客户端，以文字新闻、视频新闻、移动直播、数据新闻和短视频等不同内容形式进行融合传播，满足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需求，使中国电视对外传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7年1月，中国国际电视台融媒中心投入运营。10月15日，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上线。2018年1月23日，新华社英文客户端上线。2022年1月，中国外文局对外名称由“中国对外出版集团”正式改为“中国国际传播集团”。此外，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借船出海”、“借筒传声”，在多个外国社交平台开通账户，逐渐形成了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全方位、多角度媒体“走出去”的矩阵。<sup>②</sup>

六是学界开始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对外话语体系”进行主题检索，截至2021年底，共检索到314篇论文和文章，其中2007—2013年共有12篇，2014年增加到17篇，以后逐年增加，2021年为56篇，这表明2013年以来国家对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强调也带动了学界的相关研究。以“国际传播能力”进行主题检索，共检索到1166篇论文和文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从2008年起，学界开始重视国际传播能力研究，2009年研究成果明显增多，从7篇增加到36篇，2021年达到221篇。这些变化与中国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遇到的国际舆论问题以及学界对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重视密切相关。不同学科对对外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视，也促进了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和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为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智力支持。

---

<sup>①</sup> 刘战伟、李媛媛：《转型与抉择：中央三大央媒对外传播机构设置、平台建设与话语模式》，《新闻传播》，2019年第24期，第4页。

<sup>②</sup> 巩育华：《中国主流媒体“走出去”之路》，《群言》，2020年第11期，第22页。

### 三、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中国日益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外交层面、在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 （一）中国主题“他议”和中国形象“他塑”现象依然普遍

近年来，中国时常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国外媒体提及中国的频率极高，但是直接来自中国的声音仍很有限，中国人接受媒体访谈和对话的机会以及外文图书出版相对不足。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仍面临一些“赤字”，如世界上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期刊都是英文出版，而中国学术期刊的英文版有限，无法产生大的国际影响。例如，根据中国知网和清华大学图书馆2021年《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在“2021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中位列前10%的160种期刊中，只有37种是双语出版。再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为例，中国一直面临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的任务，而在国际影响力排在前10%的160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仅有《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评论》入选，说明该领域中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有限。此外，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文有限，尤其是在国际名刊，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和中国理论的学术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整体而言，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给世界直接提供的一手信息和资料不够，有时发声质量不高，发声渠道不够多元，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声音就更少。诚如傅莹大使指出，外界关于中国的“资讯赤字”广泛存在。<sup>①</sup>

#### （二）国际上针对中国存在信息和认知不对称

国际舆论场一直存在针对中国的话语屏障。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很多根植于历史或碎片化的信息及个别经历，有些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即使面对新事实也很难改变，甚至会转化为“立场”而被固化。<sup>②</sup>根据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及相关研究，媒介建构的现实不是对客观现实的镜式反映，而是会产生一定的偏移，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再现是思想、感情、行为的决定因素。<sup>③</sup>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就是如此。在西方世界，一直存在针对中国的主导叙事，不少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异己特征明显，而背后是深刻

① 傅莹：《看世界2》，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338页。

② 陈晋：《问答中国》，新星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③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鸿沟。<sup>①</sup>再加上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不了解,存在认知误读甚至误解和偏见,这些因素往往成为阻挡中国声音的话语屏障,即使面对新事实和新变化,这种话语屏障也难以突破。

一些国家有意误解、曲解中国,有些媒体和政客出于政治目的针对中国进行断章取义式的报道或讨论。例如,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内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快速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并且向多个国家伸出援手,开展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但是国外一些民调对中国的好感不升反降。尽管民调不一定客观,但也显示出中国投入和中国国际形象不符的问题,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并没有反映中国的实践和实情。疫情防控本身也是对各国不同方面的大考,显示了理念之争、文化之争、制度之争,各国在抗疫的同时也存在叙事之争,从而使今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凸显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 (三) 针对中国的负面信息经常误导世界舆论

长期以来,国际舆论不时出现针对中国的有意质疑甚至攻击。例如,从20世纪90年起,一些国家不断挑起“中国威胁论”。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成为国际舆论中的高频话语。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愈发焦虑,防范意识上升,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也借机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歪曲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成就,把话语重点转向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价值观等的“认同威胁”。<sup>②</sup>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变化,美国对中国加紧战略打压,全面封堵、遏制,在话语方面则不断搅动国际舆论,利用香港、新疆、疫情等话题对中国肆意攻击,推动冷战、脱钩叙事,不时批评、质疑、污蔑甚至诋毁中国,并依赖其强势话语权和国际传播能力塑造中国的负面认知,影响国际舆论走向。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主要媒体存在长期的路径依赖,经常把西方媒体作为信息源,直接转引西方媒体,导致针对中国的质疑和攻击转换为国际舆论场中的一种“普遍性”话语,甚至成为整体国际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都需要切实加以应对和回击。

### (四) 一些国家无理打压中国媒体和媒介

尽管中国在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海外自主可控的传播渠道有限,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一些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媒体的防范和打压,美英等国频繁对中

<sup>①</sup> 周鑫宇:《中国故事怎么讲》,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第160页。

<sup>②</sup> 孙吉胜:《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第52—53页。

国国际传播政策、机构和渠道横加干涉。<sup>①</sup>2020年2月18日，美国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6月22日，再次宣布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社四家中国媒体增列为“外国使团”，严重损害中国媒体的声誉和形象，<sup>②</sup>不少中国媒体记者被变相驱逐。英国通信管理局将技术问题政治化，2021年2月宣布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在英国的落地许可，终止了该频道在英国18年的落地播出。

除了针对中国官方媒体机构，西方国家还直接指向个体。例如，围绕所谓“香港问题”，2019年美国社交平台推特、脸书删除了近千个被认为参与揭露香港暴徒不法行径的中国内地账号，油管关闭了210个涉港频道，其理由是“政府背景”或“支持中国政府”。<sup>③</sup>疫情暴发后，从《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到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不断掀起“中国隐瞒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再到“疫苗外交论”，<sup>④</sup>一些国家围绕疫情对中国进行的话语打压从未停止。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仍将继续面对此类话语博弈和挑战。

## 四、中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向

面对以上境况，中国必须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关切，在世界上塑造公正、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为此，需要与时俱进、夯实基础、强化本领，在话语内容、话语风格、话语主体、话语平台以及话语人才等方面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 （一）多层话语内容

就话语内容而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首先需要明确话语重点，清楚对外应该重点讲什么。选取话语内容应基于扎实的调查研究，而不能简单把国内宣传内容直接译成外文。在不同国家，其话语受众的背景知识、文化

---

① 胡正荣、潘登：《系统性创新与交互演化——试析世界深度变局时代的国际传播精准化进路》，《对外传播》，2021年第7期，第7页。

② 《2020年7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0年7月1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007/t20200701\\_5419075.shtml](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007/t20200701_5419075.shtml)。

③ 李宇：《关于新形势下国际传播底线思维与风险防控的思考》，《国际传播》，2021年第4期，第82页。

④ 参见彭涛、何雯雯、张琳曦：《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对外传播》，2021年第1期，第31—32页。

传统及认知基础都可能大不相同，因此，需要研究话语受众的中国认知基础及认知差异，注意话语偏差和话语鸿沟，确定宣介重点，加强话语的针对性。

在具体实践中，首先要选择一些纠偏性话语，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说明，化解误解和误读。例如，有些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缺乏全面客观了解，在话语内容上可以针对性地进行解释和说明，如中国人权观所强调的发展权和生存权、中国人权发展的渐进性、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关系。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高级别会议上所说：“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根本上要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否得到满足，人民的所需所急所盼是否得到解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sup>①</sup>再如，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存在误读，这就需要对“一带一路”的内涵进行更多的话语投入，多聚焦“一带一路”带给当地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影响。

进而，要加强话语主动性，主动设置话语议题，特别是要加大以下几方面的话语投入。一是加大对中国文化理念、文化内涵和中国国情的话语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很多新主张、新政策、新倡议，其背后包含着很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体现了中国的 worldview，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之道。但是，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精神并不太了解。根据相关调查，发达国家受访者大都认为中餐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而发展中国家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中医药和武术，<sup>②</sup>可见，提及中国文化，很多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一些显性的文化符号，对理念、价值观等文化的内在机理和根本了解很少或似懂非懂，而这些往往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实质和精髓。人们只有在充分了解他人的思想后，方可真正理解他人的行为。<sup>③</sup>而且，很多外国人缺少中国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背景知识，即使把一些抽象理念译成外语，国外受众一般也很难产生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理解和共鸣，极易导致“同样的话语、同样的行为，不同的理解”。<sup>④</sup>由于体量、历史和发展特点不同，中国国情也与很多国家大不相同，许多话语在中国语境下有其独特涵义。例如，“现代化”、“小康”、“美好生活”等词汇的内涵可能与其他国家所表达的并

<sup>①</sup> 王毅：《坚持公平正义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2年2月28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202/t20220228\\_10646313.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202/t20220228_10646313.shtml)。

<sup>②</sup> 陈晋：《问答中国》，第239页。

<sup>③</sup>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第13页。

<sup>④</sup> 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62页。

不完全相同。可见，加大对中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中国国情的话语投入，会起到信息铺垫<sup>①</sup>、重塑话语语境的作用，更好地引导话语受众的理解。

二是加大对中国政治领域的话语投入。中国政治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缺乏全面认识和了解，经常停留在旧的思维框架内，对中国很多事务的理解经常先入为主，误解和偏见时有发生，认知鸿沟明显。例如，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关系持续走低，美国一些官员经常诋毁甚至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制度、中国价值观，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很多时候，人们在观察分析时持镜像思维，基于自我看法的反射，经常以自己大脑中的印象来评判对方。因此，针对中国政治加强对外话语建设，宜多选取具体事例，减少宏大抽象语言，尽可能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使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紧密联系。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扎根立足中国，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借鉴他国发展和治理经验，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

三是加大对中国实践的话语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自身实践探索取得了非凡成就，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在世界 GDP 总量年均增长仅为 3% 的情况下，中国年均 GDP 增长近 10%，使 8.5 亿人脱贫，“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要想富先修路”、“稳定压倒一切”、“精准扶贫”等话语所讲述的正是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故事。中国在环保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前些年北京被雾霾困扰，经过努力治理，2021 年北京市空气质量全面达标，优良天数达 288 天，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sup>②</sup> 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不仅授人以鱼，更重视授人以渔。中国的维和更强调发展和平。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主张标本兼治，强调过程治理、关联治理、发展治理、综合治理。<sup>③</sup> 习近平在谈到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的关系时强调，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sup>④</sup> 对中国实践进行总结、提炼、验证和知识转化，是把中

<sup>①</sup> 参见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第 141—145 页。

<sup>②</sup> 《北京生态环境质量交出亮眼“成绩单”，2021 年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新华网，2022 年 3 月 31 日，[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2-03/31/c\\_1128518360.htm](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2-03/31/c_1128518360.htm)。

<sup>③</sup> 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 年第 3 期，第 120—133 页。

<sup>④</sup>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国实践学理化、知识化的必经路径。

四是加大对中国理论的建设 and 话语投入。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当前，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外交理论，很多都是基于西方思想、西方概念和西方经验，并固化为一种西方逻辑和西方叙事，被用来解释中国外交，甚至预测中国与其他大国及世界的关系，误解和误读时有发生。其实，中国优秀文化理念和中国实践都是可以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领域，并且中外学者也已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例如，赵汀阳聚焦“天下”<sup>①</sup>，秦亚青聚焦“关系”<sup>②</sup>，阎学通聚焦“道义”<sup>③</sup>，他们都围绕自己提出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引发了更多的学理讨论。卡瓦爾斯基等国外学者也围绕“关系”概念做出了不少研究。<sup>④</sup>他们对这些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加深了对中国理念和中国实践的认识，扩大了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大国之间一直存在理念、知识和叙事之争。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世界大国，更需要强化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知识、从知识到话语的努力，打破长期存在的西方一元叙事以及西方知识的霸权地位。

当然，加强多层话语内容，要注意与世界话语体系的融通，多强调共性，而不总是突出特性，多强调共同价值和共同理念，真正做到求同存异。要多利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故事，把中国话语融入世界话语，实现话语共情。要区别对待各种针对中国的质疑和批评话语，针对立场性话语可有理有力表明态度，对于一些概念性语言需要进行话语谱系溯源，对其加以解构和重塑，以免陷入话语陷阱，对一些情感性语言则可置之不理，不计较一时得失。

## （二）多样话语风格

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清楚用什么风格来讲述、如何讲。当前，学界针对如何叙事进行了很多研究。例如，有学者专门研究美国的安全叙事，对比美国从罗斯福总统到奥巴马总统如何讲述自己面临的安全挑战、

---

<sup>①</sup> 参见 Zhao Tingyang, *All under 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World Order*, trans. Joseph Harrof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sup>②</sup> 参见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sup>③</sup> 参见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sup>④</sup> 参见 Emilian Kavalski, “Guanxi or What Is the Chinese for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8, No. 3, 2018, pp. 397-420; *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 Routledge, 2018。

如何进行安全叙事，指出为什么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sup>①</sup>叙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论证，一类是讲故事。一般来说，当面对的形势和所讲述的内容比较确定时可以用论证，当形势和内容不十分确定时可以讲故事。如果是论证，就需要言而有信、以理服人，可以用具体数字、表格及图像等予以辅助。如果是讲故事，则要突出叙事特点，把看似无关联的内容通过某种情节和各类修辞手段有条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sup>②</sup>讲故事的关键是情节要吸引人，情感要动人，以情陈事，以情明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讲述，重要的是受众易听、易懂、易记，能激起认识和情感共鸣。展开宏观论述，可从小事讲起，从小处入手讲大题目，以小故事来传播大道理。要少讲大话、空话，尽可能以真实声音、真实感受讲述真实故事。

在选择叙事风格时，要有针对性地研究话语受众，针对不同受众群体使用差异性语言，选择不同的叙事风格。一般来说，人们在对外讲述时，时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惯性思维，大多遵循演绎方法，如先讲时代背景、后讲政策依据、再讲影响和意义，但是这种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受众。因此，在讲述前要倾听和观察对方，基于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偏好进行选择。例如，有学者指出，即使在美国，至少也存在两种中国观，一种是精英版中国观，一种是大众版中国观。<sup>③</sup>针对不同的中国观可选择不同内容和风格。对官员可多用官方话语，表明政策和立场，语言严谨、逻辑缜密，对社会精英需多注意学理支撑，而针对普通大众和草根阶层则需减少官方色彩，通俗易懂。同时，要弄清对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及其兴趣点和关注点，在共性基础上再进行个性化表达。例如，美国人习惯于霸权思维，习惯于民主自由的那套话语，也经常以此来主观臆断他国行为，批评抨击中国。对此，中国在对外讲述时也可从民主入手，只不过中国的民主更强调协商性、过程性，而不是仅仅通过最终投票来体现。总之，了解话语对象，从共性入手，以个性化方式，聚焦熟悉的事，以生动、有趣、有情节的方式来讲述，让世界听到不同风格的声音和观点，在沟通中实现情感共鸣，当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过程中努力的一个方向。

### （三）多元话语主体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鼓励多元话语主体提高发声广度、密度和强度。要清楚需要由谁来讲，谁可以成为对外话语的主体。近年来，中国的政

---

① 参见 Ronald R. 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朱莉·里夫斯：《文化与国际关系：叙事、本地人和游客》，朱振明、郭之恩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③ 吴旭：《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府官员、外交人员以及媒体人员在对外宣传和对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但一般来说，不同的对外话语群体其言语习惯不同、叙事风格不同，话语重点也存在差异，对外话语群体也应力争多元。要扩大对外发声群体，尤其是民间的密集发声，以与官方话语相互补充，确保在不同场合都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不同的话语对象在信息接收方面偏好不同，多元发声主体可更好地影响不同话语受众，满足其话语关注点。

除了政府官员、主流媒体等发声，民间组织以及专家学者、青年学生、驻外企业等都可以成为对外话语主体的组成部分，通过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多个角度塑造多元、立体、可亲、可信的中国形象。例如，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谈到学者发声时强调：“大家要更多地走出书斋，走向媒体，把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贡献讲出去……希望通过各位讲述，向外界呈现一个真实鲜活、生动立体的中国。”<sup>①</sup>再如，中国在非洲做了大量修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工程，相关企业针对每个工程可以讲述很多内容，如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对当地以及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改善，让这些话语真正贴近当地民众。李子柒在油管上以短视频展示乡村生活和中国传统工艺，其订阅量以1410万刷新“最多订阅量的YouTube中文频道”吉尼斯纪录，也是多元话语主体产生传播效果的一个典型例证。<sup>②</sup>此外，多鼓励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也是增强中国话语可信度的一个方面。例如，英国的李·巴瑞特和奥利·巴瑞特父子及杰森·莱特福特、美国的马特·加拉特和郭杰瑞等都以自己的镜头拍摄了很多中国经历，展示了很多亲身感受，这些很有助于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

#### （四）多维话语平台

数字时代呈现出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及全效媒体态势，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sup>③</sup>媒体生态和媒体基础设施发生巨大变化，网络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和信息流通的重要场所，国际传播体现出很多新特点、展示出很多新规律，日益网络化、智能化、数据化、移动化。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开

---

① 乐玉成：《大疫情、大变局呼唤大团结、大作为——在第三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暨第六届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外交部网站，2020年12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2012/t20201205\\_\\_7946320.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_674904/zyjh__674906/202012/t20201205__7946320.shtml)。

② 陈晋：《问答中国》，第238—239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54页。

发和应用成为重构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新契机。<sup>①</sup> 对外话语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各种网络和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对外话语的传播主体不再仅限于国家，个体也可能成为话语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塑造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信息的即时性、跨国性和情感性都优于传统媒体，是国际传播必须关注、重视和研究的领域。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清楚可以利用哪些平台发声。一方面，需要花大力气搭建对外传播平台，拓宽发声渠道。另一方面，也可挖掘非主流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传播资源，共同参与国际传播，与官方媒体相互补充。要加强对智能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新闻写作机器人、智能影像等技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同时，要多利用现有的国际信息传播平台，如重要媒体、论坛和对话机制，积极参与讨论，增加发声广度和频率。针对误解和误读，可通过不同渠道把分歧讲清楚，防止矛盾积累和外溢，影响整体外部氛围和环境。与此同时，要积极寻找在国外媒体的发声途径，多提供信息，避免一些国外媒体总是援引美国等西方大国主流媒体的资讯。此外，应加强针对不同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关注首发效应等信息传播特点，主动择机塑造传播机会。

#### （五）多学科人才培养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有大量人才作为保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学科融通，兼顾外语能力、专业素质和通识素养。受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中国学科界限比较分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融通性。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通外语但缺专业或者精专业但外语弱的情况。

在人才培养方面，一要确保政治素质和能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大背景是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所需人才首先要具有政治意识和敏感性，要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应对各类国际场合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二要确保外语精，能够在国际场合利用外语自如交流。当前，尤其要提高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实际运用能力，不能仅停留在读写层面，要更多向听、说、辩层面提升，不仅要能够在场发声，还要避免勉强或是无效交流，确保发声有效。三要注重拓宽国际视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基于国际政治，无论从事哪个领域、哪个环节的工作，都需要了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基本情况，否则就会顾此失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四要培养家国情怀，真正理解和热爱中国，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历史和文化、国情和成就、道路与制度、政策与立场等等，否则很难向外界讲述、呈现一个全面、客观的中国。五要训练思维

---

<sup>①</sup> 段鹏：《党性与人民性的再统一：习近平关于新闻与传播重要论述的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9期，第28页。

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注意了解把握不同文化与传统的差异、禁忌和偏好，避免不必要的疏忽和失误。当前，尤其要注重特殊领域的人才培养，如国际组织人才、区域国别人才、对外传播人才、全球治理问题领域的专门人才等。惟其如此，才能筑牢、强化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人才基础。

## 结 语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外语能力、话语内容和叙事风格，也涉及话语主体，直到国际传播，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方面也做出诸多努力，取得了突出成就。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凸显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不断面临新变化、新态势。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刻处于世界聚光灯下，经常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焦点，一些国家还不时对中国进行话语诋毁和攻击，给中国制造舆情和外交压力。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需要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凝聚更多共识和力量。这些都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需要从话语内容、叙事风格、话语主体、话语平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努力，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和舆论环境，增进各国相互信任，加强国际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陈志瑞）

# FOREIGN AFFAIRS REVIEW

Bimonthly      Volume 39      Number 3      2022

---

## **The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

*SUN Jishe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been improving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nd making various efforts to improve it such as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roaden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enriching discourse content, increasing discourse initiative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China also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The phenomenon of “China discussed by others” and “Chinese image shaped by others” is still common. There are deep-rooted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reading of China. Some countries unreasonably suppress Chinese media and relevant agencies. Negative information against China often misleads world public opinion, making China face various kinds of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requires not only basic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professional ability, discourse shaping ability and public opinion leading ability, but also th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empathy. To better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better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pe a fair,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view towards China in the world,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t multiple levels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in terms of discourse content, styles, subjects, platforms, and multi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 create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environment, better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mprove national image.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 continue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with other countries,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jointly address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with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discursive abili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ursive power,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China view

##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Roots**

*ZUO Xiy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emerging. As it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becomes dysfunctional, the US finds it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be the can-do power, which is the syndrome of the collapse of liberal world order. The causes of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risis lie in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power, the change of its world view and its reluctance to lead the world as a global hegemon. However, there are deeper domestic roots, mainly vital problems in social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hollowing out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shrinking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cline of rationality in society. These problems have eroded the American democrac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renewed democracy at home by revitaliz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fostering the middle class. At the same time, Biden has also tried to unite the democratic alliances and partners, and re-embed the domestic society into the inner-circle of Western democracies. He no longer seeks to promote the liberal order to the whole world, but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o shrink the liberal camp and move towards particularized approach in foreign policy. Although Biden has been quite successful in dealing wit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has improved the US's external situation, it does not mean tha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s come out of the crisis.

**Key wor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eral order, Western countries, Biden administration, great power relation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 **Security Competition Intensity, Party Politics and Small and Middle Powers' Cooperative Strategies toward Great Powers**

*ZHONG Zhu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S-China competition, why are some countries joining the China-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le maintaining alliances with the US? The explanations of "dual structures" and "hedging", focusing on great pow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limited to the cases